

##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改革疲劳症”

郝宇青

(华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调整和社会分化的过程。在利益调整中有社会的分化,在社会分化中利益得以再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的调整和社会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分化成为了改革的动力。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的调整却逐渐变成了利益的集中和固化;社会的分化却变成了阶层的固化和纵向社会流动的下降。这种情况可谓是“社会分化的劣质化”。社会分化的劣质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改革的阻力,成为了“改革疲劳症”的重要诱因之一。而要消除“改革疲劳症”,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社会整合,即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重构改革动力。

[关键词]“改革疲劳症”;社会分化;贫富分化;阶层固化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6.00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始终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政治议题。在 1985 年 8 月 28 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作了题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sup>[1]</sup>的谈话,就鲜明地肯定了改革对于中国的意义。在 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sup>[2]</sup>南方谈话不仅再次强调了改革的意义,而且也给改革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可以说,正是改革给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因而改革在推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调整和社会分化的过程。在利益调整中有社会的分化,在社会分化中利益得以再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的调整和社会的分化,其目的都是为了理顺生产关系,从而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分化可以看作是改革与发展的动力。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利益的调整却逐渐变成了利益的集中和固化;社会的分化却变成了阶层的固化和纵向社会流动的下降。这种情况,笔者把它概括为“社会分化的劣质化”。本来,社会分化是推动我国改革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社会分化的劣质化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改革的阻力,成为了“改革疲劳症”的重要诱因之一。

作者简介:郝宇青(1970—),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基层社会治理等研究。

其实,关于“改革疲劳症”的话题,其来有自。2012年9月13日至10月25日,《人民日报》评论部连续推出4篇“锻造我们时代的精神气质”的评论文章——《解放思想,永葆与时俱进的锐气》《改革开放,永葆探索创新的朝气》《凝聚力量,永葆团结奋发的士气》《攻坚克难,永葆不惧风险的勇气》,呼唤改革创新的精神的同时,对“改革疲劳症”进行了尖锐的批评。2018年12月1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了《以奋斗姿态将改革进行到底》一文,再次对“改革疲劳症”给予批评。由此可见,“改革疲劳症”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病。如果不加以铲除,那么,势必会影响到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

### 一、“改革疲劳症”的定义及其症状

弄清楚“改革疲劳症”的定义,是展开本文讨论的前提。而要弄清楚何谓“改革疲劳症”,则首先要弄清楚何谓“疲劳”。那么,何谓“疲劳”?《辞海》的解释是:它是指“持久或过度劳累后造成的身体不适和工作效率减退的现象。”<sup>[3]</sup>据此,“改革疲劳症”是指在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出现了持续的利益分化而导致了改革的疲倦情绪。这里,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有一部分人由于在较长时间内未能实现改革期待中的利益而导致了“期待疲劳”,进而导致了厌倦改革的情绪;二是另一部分人由于在较长时间内享有较多的改革利益,而导致了安于现状、不愿改变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的状况,进而造成了改革动力不足、改革绩效衰减的现象。

从上述界定中,可以清楚地找到“究竟谁患上了‘改革疲劳症’”这一问题的答案,即改革的受益者和改革的相对受损者是“改革疲劳症”患者的主体。正是他们对改革所持有的主观认知和客观感受,而形成了改革疲劳的复杂的社会现象。

所谓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指在改革过程中获益较多的富裕起来的群体。他们属于先富裕

起来的一方,属于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方,但是,不论他们是如何富裕起来的,他们在主观愿望上都很少愿意分享富裕的果实,很少愿意“共富”,而且,在他们看来,维持现状对于他们是最为有利的,因而他们安于现状,乐于守成,改革的动力不足,改革的绩效衰减,在某种情况下,他们甚至成为了改革的阻碍力量,这不是他们不思进取,而是他们基于保守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愿推动改革的深化。其实,正是因为他们的“保守”,而使得改革“进入‘深水区’”,进入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制约的攻坚阶段,触及的矛盾越来越复杂,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sup>[4]</sup>这也是为什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中,特别强调要“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sup>[5]</sup>的原因所在。

所谓改革的相对受损者,主要是指在改革过程中相对于富裕起来的群体而言,他们获益较少,属于相对贫困的群体。在他们中间弥漫着较为严重的相对剥夺感。这部分群体并不是没有得到改革的利益,只是相对较小,也正是在这种比较中,他们更多地倾向于认为,他们所期待的通过改革而富裕起来的目标,并没有能够实现。在改革的期待未能实现的情况下,难免会在他们中间形成期待疲劳,进而出现对改革的厌倦情绪,丧失了改革的动力。这也就是说,改革的“徒劳”,必然导致改革的疲劳。可以看到,在这一群体中间,甚至有部分人渴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共同贫穷”状态。其实,从本质上看,这种情绪并不是渴望得到“贫穷”,而是渴望计划经济时代的相对的平等。因而,这种情绪折射出的是对改革所产生的不公平而表达出来的不满。

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来意义上,改革的相对受损者(贫穷群体)是不会出现改革疲劳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更加渴望通过改革、通过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格局的调整,来实现摆脱贫穷或相对贫穷的状况,因而他们没有理由反对改革、拒绝改革。而且,在改革之初,由于不少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是被贫穷“逼”出来的,因而我们

常常说我国的改革是“倒逼式”改革。既然是逼出来的改革,那么,肯定不是作为改革主导者的政府的主动作为,在这个意义上,群众才是改革的施动者。在改革的启动、改革的过程中,都包含有“逼”的成分。但是,为什么改革的施动者会厌倦改革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改革期待没有能够在改革的过程中得到满足,因而他们患上了“改革疲劳症”。然而,在笔者看来,改革的相对受损者的“改革疲劳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疲劳。实际上,他们仍然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仍然渴望进行新一轮的以打破利益固化、实现改革和现代化成果共享为目标的改革,以达到摆脱贫穷或相对贫穷的状态,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和享受更实在的利益。

而在当下的中国,真正患上“改革疲劳症”的,则是改革的受益者群体。因为他们是先富裕起来的群体,是社会上的强者,是改革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方。尽管我国的改革是“倒逼式”改革,但是,到了利益固化阶段,这种倒逼的作用对于改革的推动已明显不在,改革的受益者群体对于改革的影响力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因此,关于“改革疲劳症”的相关议题,应加强对改革的受益者群体及其动机进行研究。那么,改革的受益者群体的“改革疲劳症”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同志曾针对党政机关和干部的“改革疲劳症”的症状有过专门的阐述。他指出:“面对新一轮改革,有些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会激化矛盾,在思想上求稳怕乱;有些部门担心改革会削弱自己手中的权力,对改革敷衍了事;有些地方担心改革会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怕得罪人,怕惹火烧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无所作为。”<sup>[6]</sup>当然,这只是改革的受益者群体“改革疲劳症”的主要症状,它还有以下两种表现:进行形式主义的表面改革,而不触动存在的实质问题,无助于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为了部门或地方利益而进行的假改革,或主动设租,或骗取国家资财,等等。总之,不论是瞻前顾后的不改革,还是形式

主义化的表面改革,还是以贪污腐化为目的的假改革,其实质都是为了保守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愿推动改革,不愿将改革进行到底。这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不符合“四个全面”战略等要求的。

## 二、社会分化是推动我国改革的主要动力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中国,其“国家性格”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建构起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把人民组织起来的体系”。<sup>[7]</sup>而这种“把人民组织起来的体系”,其运行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整齐划一。尽管在当时的中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态,但是,恰恰也正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造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立,形成了城市的整齐划一与乡村的整齐划一并存的局面,两者各自独立运行,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之下,彼此也相安无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是整齐划一的。

组织起来的社会体系以及整齐划一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分配体制上的整齐划一,而且城市和农村各有自己一套完整的规则),对于一个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不仅有利于迅速建构起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而且也能够社会主义集体道德的名义下动员民众树立起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精神气质。但是,由于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忽视个体差异、不顾个体利益诉求、不承认(更不允许)社会分化、不尊重价值规律的,因而,尽管在政权建立初期有社会运行的高效率,譬如,到1956年就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考察,人们可以在短时期内为某一理想目标的实现而“勒紧裤腰带”,如果时间长了,理想目标不能实现,政治承诺不能兑现,那么,因理想目标而兴的奋斗精神和动力就会下降。形式上轰轰烈烈

的“大跃进”，表面上看起来动力十足，但最终结果却是削弱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干劲。对于这种现象，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sup>[8]</sup>

整齐划一的制度安排自然不会出现社会分化，无法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并出现了“共同贫穷”的难以为继的局面。邓小平对此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sup>[9]</sup>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并通过改革来扭转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共同贫穷的状况。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了。

在某种意义上，共同贫穷可谓是我国改革的起点，而打破共同贫穷的局面则为改革提供着动力。邓小平即曾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sup>[10]</sup>可见，要进行改革，首要的就是要打破整齐划一的体制和共同贫穷的局面，以分化已经“板结”了的社会，而这种分化反过来又成为我国改革的原初动力。<sup>[11]</sup>或者说，改革推动了社会分化，打破了共同贫穷的局面，而社会分化又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动力。

就社会分化的内容来说，它主要包括经济利益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分化等。经济利益分化主要表现为社会财富流动性的增加，社会结构分化主要表现为人的流动性的增加。在改革的进程中，社会分化作为改革的主要动力，具体表现为：

经济利益分化推进改革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早在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提倡按劳

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sup>[12]</sup>在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又再次强调：“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sup>[13]</sup>实践证明，“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发挥了带头作用，引发了竞争意识，从而为改革提供着动力。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利益分化作为改革的动力是有一定条件的，即经济利益分化必须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至于出现两极分化的境地。也就是说，人们的经济利益可以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不至于无法通过诚实劳动而实现超越。其实，正是可以通过诚实劳动而实现自身经济地位的超越，在不断地激励着人们去努力、去奋斗，从而为改革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对于经济利益分化所产生的改革动力，有学者从嫉妒这一社会情绪的角度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嫉妒的社会情绪之所以可以转化为行动动力，就在于还有改变自身状况的可能性。<sup>[14]</sup>

社会结构分化推进改革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鼓励人们“到体制外去”、到市场中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是可以预测的，而且社会主义中国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消灭了失业现象（尽管也有一定比例的失业人口存在，但是我们不叫“失业”，而冠之以“待业”的名称，即等待就业，所以，这也是人们的工作都是由国家按计划分配的，而不是自主择业的原因），这样，在社会上基本就不存在竞争关系。而改革就是要冲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引入竞争机制，并通过竞争为改革提供动力。

当然，“到体制外去”，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家没有关于体制外活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社会中的人们长期受到计划体制的浸润而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所以，自1978年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之前的10

多年间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形成“到体制外去”的社会环境。尽管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遇到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尴尬,但是,他们还计划体制抱有幻想。尽管在这一时间段里乡镇企业大量出现,并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通常这被看作是第一次“民工潮”),但是,这些农民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情况对计划体制和城市体制的冲击并不大。而且,那时的农民还不敢往大城市跑,国家也不愿看到农民的自由流动,这不仅有户籍身份的制约,而且在大城市也没有多余的工作岗位可以提供。邓小平在1983年考察完苏州等地后仍然对农民的流动存有疑虑,并对苏州的做法予以肯定:“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sup>[15]</sup>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sup>[16]</sup>但是,改革仍然是在计划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它并没有对社会结构的分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万元户”的流行语,它作为“发财致富”的符号标记,曾经诱发了巨大的社会想象,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动能,<sup>[17]</sup>但是,它所产生的动能并不足以冲破计划体制的堡垒。

要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必须冲破计划体制的堡垒。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为改革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社会提供了巨大的“体制外”空间,为人们“到体制外去”提供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引领下,国企、政府公务员等“体制内”工作开始逐渐受到冷落,失去了“铁饭碗”的吸引力,“到体制外去”成为人们的重要选择。例如,对于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他们倾向于去体制外的民企、外企等就业,这不仅只是因为体制外企业的高工资,还有体制外企业的灵活和人性化的工作环境。而且在2003年以前,很多大学毕业生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工作。据报道,“1994年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才不过4万余人。”<sup>[18]</sup>“下海”成为了一个极具感召力的词汇,它不仅象征

着勇气和征服,也象征着金钱和财富。又如,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当年(1992年),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开发区(甚至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农村地区也一哄而上),<sup>[19]</sup>再加上取消了城市粮食供应制度,1992年就有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这被看作是第二次“民工潮”。第二次“民工潮”和第一次“民工潮”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异,那就是:农民“既离土又离乡、既进厂又进城”。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农民的一次革命,他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冲破了农村农业体制的羁绊,到农业体制外就业,尽管他们受到一些城市人的“白眼”甚至不公待遇,但是,“到体制外去”的、摆脱了土地生产关系束缚的农民所创造的生产力却是巨大的。199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4.3%,远超原先6%的增长预期。由此开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快车道,到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总之,“到体制外去”的人们,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单一社会结构,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再分化,而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再分化又推动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和经济利益分化一样,社会结构分化作为改革的动力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即社会结构分化必须有助于人们的社会流动尤其是纵向社会流动,不至于出现阶层固化的境地。

### 三、社会分化的劣质化与改革动力的衰减

本来,社会分化是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为改革和发展提供着正能量。这正是:改革每向前发展一步,都离不开社会分化的推动。但是,社会分化对改革的正向推动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即经济利益分化必须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没有出现经济利益的过度集中;社会结构分化必须有助于人们的社会流动尤其是纵向社会流动,没有出现阶层的代际固化。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分化和调整却逐渐变成了经济利益的集中;社会结构的分化却变成了阶层的固化和纵向社会流动的下降。这种情形即为社会分化

的劣质化。可以说,社会分化的劣质化阻碍着改革的深入发展,造成了改革动力的衰减,从而成为“改革疲劳症”的重要诱因之一。

那么,社会分化的劣质化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它又是如何造成了改革动力的衰减呢?

社会分化的劣质化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既然社会分化的劣质化可以分为经济利益分化的劣质化和社会结构分化的劣质化两个方面,那么,考察社会分化的劣质化及其对改革动力的影响,自然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改革的过程就是调整生产关系的过程,而调

整生产关系的过程最主要表现为调整物质利益的过程。生产关系理顺了,尤其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调整好了,就可以减少社会运行成本,增强社会活力,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为改革提供动力。但是,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在经济分配领域却逐渐出现了不公正的问题。而且,自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之后,经济利益分化的速度和强度也随之不断扩大,分配领域的不公正问题开始凸显。从表1所反映的中国历年基尼系数<sup>[20]</sup>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表1 中国历年基尼系数统计(1981—2018)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基尼系数	0.288	0.2494	0.2641	0.297	0.2656	0.2968	0.3052	0.382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基尼系数	0.349	0.343	0.324	0.376	0.359	0.436	0.445	0.485	0.403	0.403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基尼系数	0.397	0.417	0.490	0.454	0.479	0.473	0.485	0.487	0.484	0.491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基尼系数	0.490	0.481	0.477	0.474	0.473	0.469	0.462	0.465	0.467	0.474

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初期也有经济利益的分化,但是,在1993年以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以下,说明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尽管在当时也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例如,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有些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也被卷到里边去了。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

图的商人。”<sup>[21]</sup>但是,这种“歪风”并不是主流,大家仍然相信“勤劳致富”,即使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观念、行为,大家仍然相信这些都是改革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并相信这些都可以通过改革加以解决,所以,大家的心理情绪是积极向上的,大家都奋斗在“希望的田野上”,因此,此时改革的动力是充沛的。

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为中国的改革注入了强大动力。199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14.3%,实现两位数的增长,此后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高位增长(见下页表2)。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也在发生着变化。从1990年世界排名第十,到1995年世界排名第七,2000年世界排名第六(超过“西方七强”中的意大利),2005年世界排名第五(超过“西方七强”中的

表2 中国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1992—2018)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增长率(%)	14.3	13.9	13.1	11.0	9.9	9.2	7.8	7.6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增长率(%)	8.4	8.3	9.1	10.0	10.1	11.3	12.7	14.2	9.6	9.2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增长率(%)	10.6	9.5	7.7	7.7	7.4	6.9	6.7	6.9	6.6

法国),2006年世界排名第四(超过“西方七强”中的英国),2007年世界排名第三(超过“西方七强”中的德国),再到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的强大动力,我国在经济领域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

但必须承认的是,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对应,经济利益分化的速度也在加大。在1998年出现的“国退民进”中<sup>[22]</sup>、在1998年开启的住房货币化改革中<sup>[23]</sup>、在2003年的“国进民退”中<sup>[24]</sup>,等等,诸多的改革事件和改革举措,在发挥推进改革作用的同时,也强化了分配领域的不公正问题,以至于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从表1显示的数据看,自1994年开始(1999年除外),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的警戒线,表明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处于不合理的状况。目前我国的贫富分化现象,并不是表现出绝对贫困的状态,而是相对贫困,是相对于富的一方快速获得财富而言,贫的一方获得财富的速度缓慢,甚至是停滞的,而且在财富的分配方式方法上,实体性的劳动成为获得财富最为笨拙、最为缓慢的途径。资本、技术等要素介入分配,固然有利于调动一部分人的积极性,但由于没有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调节,使得底层民众依靠诚实劳动发财致富的可能性降低,并使得社会具有了朝着两极分化方向发展的态势。这种状况就是经济利益分化的劣质化。

存在经济利益的分化是必要的,“大锅饭”的弊端反证了这一点。但是,造成底层民众没有发财致富的机会,通过诚实劳动实现向上流动的希

望难以实现,这在贫的一方看来是极其不公正的,而且他们也不会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到自己头上,而是指向社会、指向国家政策。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心生怨气是必然的,而这种不满心理很容易造成对改革的负面态度和认知,生发出对社会的不友好的极端态度和极端行为。目前,社会上有一种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去的舆论,这其实是反改革的。又如,社会上存在的暴戾之气,存在的“仇官”“仇富”等不健康的社会心理,<sup>[25]</sup>这不仅不会推动改革,反而会成为改革的障碍,造成改革动力的衰减。

曾几何时,有一部分人(包括部分学者)曾经以“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的观点,来为改革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辩护。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倾向于认为腐败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但在实质上,腐败本身就是经济利益分化劣质化的一种表现,这个观点的谬误在于:它并不懂得民众的政治心理。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群众对自己不得担任公职,不一定感觉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专管家业;但一听到公务人员正在侵蚀公款,他们就深恶痛绝;他们因此才感觉自己在名利两方面都有所损失了。”<sup>[26]</sup>可见,腐败不能赢得民心,而且会导致因腐败而得利的一方与民众的对立,导致竞争精神的瓦解和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导致社会运行成本的增加和政治经济的衰败,因而腐败绝不会成为改革的动力,换句话说,腐败只能成为改革的阻力。

经济利益分化的劣质化造成了改革动力的衰减,同样的,社会结构分化的劣质化也造成了改革动力的衰减。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利益分化的结果除了造成贫富分化外,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分化。这就是说,社会结构分化是经济利益分化的产物。在经济利益分化呈现出劣质化的同时,社会结构的分化也出现了劣质化的情形。

那么,社会结构的劣质化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尽管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人平等是基本的社会准则,但是,由于先赋的因素和后天的努力是各不相同的,因而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的。同时,社会部门、行业内部也是存在一定的等级秩序的。这样,对于社会个体来说,就有了纵向的社会流动。通常情况下,一个社会能够保持顺畅的社会流动,尤其是纵向的社会流动,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够保持活力与和谐。就目前我国纵向社会流动而言,其状况并不乐观。由于纵向社会流动的空间狭小,以至于在社会上形成了对于纵向社会流动机会的恶性竞争,各式各样的潜规则大行其道,并恶化了社会风气。针对这种纵向社会流动不畅的现象,人们用“代”进行了概括:官二代、富二代、民二代、穷二代、学二代……虽然这样的概括有点绝对化,但也基本反映了社会现实。北京大学博士生冯军旗通过深入调研后发现,在“中县”这个农业县里,副科级及以上干部有1000多人,但是,这些干部中间存在着明显的家族化的特点。大概有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sup>[27]</sup>“中县”干部的家族化倾向,在中国并非个别现象。而干部家族化倾向却阻断了许许多多人的梦想。试问,当无论一个人多么的努力,却都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他想通过改革来打破这种社会结构固化的状况,但是又没有办法把它设置为改革的议程。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沉默和服从,或者说是安于现状,没有其他的选择。

一句网络上流行甚广的话——“我努力了十八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虽属调侃,但

也流露出不少的无奈。如果说,在十四大开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初,人们敢于“下海”,敢于“到体制外去”,而如今“到体制内”却成为了许多大学毕业生的首选。<sup>[28]</sup>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然而,为数众多的青年却首选稳定而有保障的工作,而没有了敢闯敢拼的勇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动力的衰减。

#### 四、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重构改革动力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sup>[29]</sup>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发展起来、强盛起来,才能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道:“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sup>[30]</sup>他还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sup>[31]</sup>这些话都表明:改革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形成了“只有改革才有出路”的共识。即使在改革进程中遇到了困难和挫折,那也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解决,而不是裹足不前。这也就是“以改革来推动改革”。当然,就改革的动力而言,社会分化可谓是根本性的动力。正是通过社会分化而推动了改革的发展和深化。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改革进程中,由于发展的心情过于迫切,<sup>[32]</sup>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了过于注重经济发展主义、过于强调GDP和效率的政策措施,再加上对各级干部的考核与晋升的依据也主要是经济绩效,这更加刺激了各地、各部门只顾自身发展却没有整体大局观念的政绩锦标赛。因此,在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社会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快速增加。对此,有学者即指出:“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带来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忽视,社会



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由平均主义、普遍贫穷让位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sup>[33]</sup>

应当说,这些问题主要是社会分化的劣质化方面的问题,而它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改革动力的衰减。对于社会分化劣质化现象所带来的危害,罗素曾指出:当人们越来越变为分散的个体,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存在,这样就“没有一个由共同的根本目标所维系的真正的社会。这种缺乏共同目标的现象已变为不幸福的一个源泉。”<sup>[34]</sup>因此,为了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克服社会分化的劣质化问题,即保持适度的社会分化(这是社会保持一定张力和活力的重要条件),又不至于出现两极分化和纵向社会流动的停滞。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最大多数人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成果。

其实,让最大多数人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成果,就是社会分化之后必须进行的社会整合。前文指出,社会分化是我国改革的重要动力,这只是说了一半,另一半应当是:社会分化之后必须进行社会整合。用邓小平的话来表达,“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sup>[35]</sup>其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社会整合。邓小平同志曾这样指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而言,“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sup>[36]</sup>因此,为了避免改革失败的情况发生,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以避免两极分化,避免社会分化的劣质化。而这个措施和手段,就是社会整合。可以说,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整合成为了改革的重要动力。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报告还特别强调:“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sup>[37]</sup>应当说,实现

“美好生活”是改革开放的最为主要、最为根本的发展目标,然而,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是十分突出的,十九大报告没有回避问题,而且承认:“这(指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自按)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其实,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即可以看作是社会分化的劣质化的问题。它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制约因素,因而十九大报告给出了相应的对策:“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sup>[38]</sup>如此,通过社会整合,化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致力于实现“美好生活”,让人们有更多的获得感,方能够重构出改革的强大动力。毕竟,人们对改革的期待是需要获得感来维持的。假如人们对改革的期待是落空的,那么,改革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当然,要在当前存在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的条件下进行社会整合,不仅需要全体民众的努力,更需要改革的受益者群体的支持,真正发挥“先富带后富”的作用。具体来说,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采取税收、社会保障等经济调节手段。政府应进行强有力的制度建设,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改进利益分配体制和利益分配方式,在实现发展效率的同时,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公正,防止社会分化的劣质化。

二是培育全民的共同体精神。尤其是改革的受益者群体更应该认识到,共同体存在的重要性,以及培育共同体精神的路径。对于任何一个共同体来说,“不平等现象是共同体赖以存在的绊脚石”。<sup>[39]</sup>应当说,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分化的劣质化现象,已经对我国民众的共同体意识构成了挑战,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严重削弱着社会资本,增加着社会运行的成本。如果不消除社会分化的劣质化现象,那么,它所带来的社

会政治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包括政府在内的改革的受益者群体应当致力于消除贫穷和不平等,致力于消除社会分化的劣质化,这是培育全民共同体精神的经济条件。

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新阶段,所要改革的东西都是一些“硬骨头”“险滩”,因而,更加需要我们有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更加需要我们为改革提供足够强大的动力。在这种条件下,要进行社会整合,要让改革的受益者群体真正发挥“先富带后富”的作用,必定会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改革不能因此而止步,而是要下定社会整合的决心、增强社会整合的信心,以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增进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就明确指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sup>[40]</sup>总之,在社会分化的劣质化的条件和背景下,改革需要加油,需要动力的增能,需要持续不断的动力再生产。

## 五、结 语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改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sup>[41]</sup>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换的宏大背景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要求下,更加需要以改革来推动和实现。

然而,目前在中国却出现了关于改革的疑问,出现了“改革疲劳症”,这是不正常的。当然出现“改革疲劳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分化的劣质化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社会分化的劣质化已经成为改革的阻力,因而,要为改革赋能、增能,自然需要改革来推动,需

要以社会的公平公正来赢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达了改革永无止境的观念,凸显了坚持改革的决心。我们也相信,中国在改革中发展,在改革中成长,在改革中壮大,必然在改革中走向辉煌。

## 注释:

[1][2][13][15][16][21][29][35][3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6、370、23、25、29、43、113、142、139页。

[3]《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2758页。

[4][6]汪洋:《克服“改革疲劳症”》,《西部大开发》2012年第9期。

[5][40][4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7][美]安吉洛·M.科迪维拉:《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张智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5页。

[8][9][12][30][3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191、258、311、312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09页。

[11]郝宇青:《从分化到整合: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转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4]成伯清:《从嫉妒到怨恨——论中国社会情绪氛围的一个侧面》,《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

[17]胡范铸、胡亦名:《作为“事件”的流行语与中国“十字架身份体系”的崩裂——从“万元户”用法的兴衰看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18][28]潘晓凌、范承刚:《年轻人,到“体制内”去》,《南方周末》2011年3月1日。

[19]据一本研究改革开放史的著作记录:“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到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1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参见朱文轶:《总设计师的“举重若轻”》,《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6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城市经济发展为农民工的进城提供了巨大空间。

[20]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其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它越接近0,表明居民的收

入分配越是趋向于平等。一般情况下,0.2以下看作是居民收入绝对平均,0.2~0.3看作是居民收入较为平均与合理;0.3~0.4看作是居民收入相对合理;0.4~0.5看作是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在0.5以上时,则看作是居民收入悬殊。

[22]1993年开始出现了“国退民进”的大潮,其特点是:在国有经济存量不变的情况下,大力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与1993年的“国退民进”不同,1998年的“国退民进”,其特点是:国有经济存量的变化。此时,中央提出了“抓大放小”的策略,以推动国有经济的改革。所谓“抓大”,就是指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使其可以成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所谓“放小”,就是指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放小”主要是通过租、包、卖等形式,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非国有化改制。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对于盘活国有资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且在国有资产流失过程中,不乏有权力的腐败,不乏有官与商的合谋,不乏有措施不当的甚至非法的行为。于是,一些官员在“放小”中进行着权力的设租、一些商人在企业购并中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和集中,甚至一些商人成为了权力的附庸,成为了权力的代理人。可以说,正是在“放小”和购并中,实现了官商之间的结盟。在改革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坐大,通过自我强化,成为了深化改革的现实阻力。这样,这一财富的积累和集中,一方面制造着富豪,制造着富者愈富、一夜暴富的神话,另一方面却在制造着贫困,制造着贫富的分化。

[23]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应当说,住房制度改革对于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地方政府受到“土地财政”的制约,在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上用力颇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不得不走上逐利的道路。本来用以居住的房子,却在多方力量(包括政府)的共谋下,使得房子变成了保值增值的商品,变成了畸形的金融衍生品。然而,房子是从来嫌贫爱富的,富者可以购买多套房子,他们不仅推高了房价,也使自已可以通过投机行为而大获其利,而且也使一部分人成为“房奴”,从而房子成为了加剧贫富分化的工具。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其实就可以看作是对我国畸形的房地产市场的批评。

[24]2003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批准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直属国务院,专门负责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以此为起点,开始了“国进民退”的进程。因为在国资委成立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重大改革,其中规定:只有进入行业前三名的中央企业,才能免于淘汰。这就导致不少中央企业为免于被淘汰的命运,而不得不进行扩张、收购和兼并,与此同时,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在中央企业的强势发展态势面前显得步履维艰,困难重重。这是经济领域的又一次洗牌,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源和财富向国家和少部分人的集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人的贫困化。这真有点像是中国版的“双城记”。

[25]陶文昭:《中国民粹主义新特点:“三仇”、“两求”与“两过”》,《人民论坛》2016年第13期。

[2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69页。

[27]冯军旗:《中县干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51-161页。

[32]邓小平在1979年10月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的心情。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33]王绍光、胡鞍钢、周建明:《第二代改革战略: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34][英]柏特兰·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张师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2页。

[37][3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39][英]保罗·霍普:《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沈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6页。

[责任编辑:马立钊]